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 社会研究 与社会政策

罗伯特·K·默顿 著  
林聚任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



罗伯特·K·默顿 著

林聚任等译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 社会研究 与社会政策

罗伯特·K·默顿 著  
林聚任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Robert K. Merton, 1982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美)默顿著;林聚任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8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ISBN 7-108-01565-X

I. 社… II. ①默…②林… III. ①社会分析②社会政策-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0710 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冯金红  
封面设计 张 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字 数 275 千字 图字 01-1999-1811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 总 序

近代中国人之移译西学典籍,如果自 1862 年京师同文馆设立算起,已逾一百二十余年。其间规模较大者,解放前有商务印书馆、国立编译馆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的工作,解放后则先有 50 年代中拟定的编译出版世界名著十二年规划,至“文革”而后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有这些,对于造就中国的现代学术人材、促进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支持下,创办“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意在继承前人的工作,扩大文化的积累,使我国学术译著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文库所选,以今已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旨在拓展中国学术思想的资源。

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是所望焉。谨序。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1986 年 6 月于北京



## 中译本前言

罗伯特·K·默顿是一位社会学理论家,更是一位社会学大师。他所关注的并非像塔尔科特·帕森斯那样去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而是努力探讨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途径。故默顿的研究以“致密的分析技巧”和“精练的经验取向”为基本特征;他本人也便有了“社会学先生”的美称。

默顿社会学研究思想的一个精髓之处,就是强调经验研究必须以理论为指导,而理论研究又离不开经验证明。他提出,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相互渗透,是任何社会学研究所必需的。默顿曾尖锐地指出:我们不喜欢那样的社会学家,他们只空谈而不观察,或者只观察而不思考,或者只思考而不使他们的思想接受系统的经验研究的检验。他后来总结说:“长期以来假想的那种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相互脱离是我自始反对的,而使两者结合则是我的贡献。”(阎鹏:“真正的知识超越国界——访当代社会学大师罗伯特·默顿”,《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3期,第2页。)

本书作为默顿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收录了他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的部分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即突出地反映了他的社会学思想的这一特征。一方面,默顿强调理论研究应具有经验取向。例如,他提出并强调“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意义(第十章),认为这一理论是以著名的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情境当作是真实的,那么其结果将成为真实的——为基

础的。这一定理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行动的基本特征。因此,默顿认为,说明“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并使之被大众所接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可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现存的民族关系、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偏见等现象的理解(他在1989年所发表的回忆性的文章中又做了详细说明,参见本书附录)。

另一方面,默顿十分强调经验研究应以理论为指导。他提出,社会学知识对任何类型的社会研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社会知识与公共政策”一章中,默顿通过对四个总统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分析后提出,以政策取向为主的社会研究,也都涉及到社会学知识的应用。故得出:“委员会总体上都离不开社会学知识”。认为委员会行为中的各种社会过程、结构和功能可以说都与社会学本身的各类问题相关联。

所以,默顿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具有显著的经验性(故他常被称为经验功能主义者);而他对具体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考察总是蕴涵着丰富的理论意义。

默顿社会学研究的另外一个特征是研究问题的多样性。默顿的学术视野宽广,研究取向和问题多样化。这一特征在本书中也有突出的反映。他的研究广泛涉猎到了科学制度(他被尊为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知识、社会问题、专门职业、医学教育及社会政策等诸多领域。对此,默顿本人曾解释说,他的研究一直是让自己跟着学术兴趣的变化走,而不愿事先确立起终生的研究计划。故他认为自己所追随的是涂尔干的研究道路。

默顿社会学研究问题的多样性还与他所主张的理论观点的多样化有关。作为功能主义观点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的理论主张却与另一位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有明显分歧。帕森斯主张建立统一的“大理论”,但默顿倡导首先发展经验性的“中层理论”,而且认为中层理论应是多种多样的。他提出这是知识发展的内在要求和



特征。例如他说：“现代理论、范式、思想模式的多元化并不只是存在着,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伴随着每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而出现的现象。相反,它是各学科发展中内在的受社会因素影响的认识过程。随着科学的制度化,科学家的研究行为趋向于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和相互批评,从而导致了理论上的多元化。”(罗伯特·默顿:“略论理论多元化”,见布劳和默顿所编的《结构研究续篇》序言,塞奇出版社,1981年)

因此,通过本书我们不但可以深入了解默顿的社会学理论思维的特征,而且本书对于我们认识社会研究的性质、对于更好地处理社会学知识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此书的翻译断断续续,历时两三年,终于面世了,这与诸多学界前辈、朋友、同学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将首先感谢我一直敬仰的罗伯特·K·默顿先生。我对默顿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其科学社会学观点可谓情有独钟。自1987年我与默顿先生建立书信联系至今,已过去了十几载。期间他给予了我大力的学术上和资料上的支持,也包括对本书的翻译,自始至终他都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学术上的帮助。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当我提出请他为此中译本写序时,他不顾近90岁的高龄,又在身体欠安期间,欣然应允。而且如我们所见的,他写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相当长的新序言。足见他对此中译本出版的重视。

我同时要感谢苏国勋先生对此书的翻译出版所给予的鼓励和帮助。作为一位知名的社会学理论家,他非常重视译介国外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名著。对翻译默顿等当代社会学家的著作,他更是热心扶持。正是由于苏先生的这种支持,才使我译介默顿著作的想法得以实现。

本书的翻译完成也是我们合作的结果。李一松翻译了第七

章,陈大红草译了第五章和第九章,赵萍帮助翻译了第六章的大部分内容。全书由我做了最后的通译和修订工作。

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向多位师友请教。他们包括:李树来教授、曾忠禄博士、韩召颖博士、晏辉博士、张加才博士等。

我要感谢李蕴女士和赵亚萍女士,他们不辞辛苦,帮助打印了大部分文稿。还要感谢社会学系的许多同学,他们帮助校对了文稿。

最后,我对三联书店及其他同志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林聚任

2000年3月于泉城

## 作者中译本序言

尽管当代迅速的“全球化”观点几乎已表现在了社会与经济的方方面面,但语言界限仍然是思想传播的障碍和缺陷。因此我的某些社会学观点能被译成中文,我感到极为荣幸。

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艾伦·罗森布莱特(Aaron Rosenblatt)和托马斯·F·吉伦(Thomas F. Gieryn)这两位编者把我的文章按三种类型做了选编:第一类是有关社会研究的社会学方面的;第二类涉及到作为不同于其他各种职业(occupations)的专门职业(professions)的社会和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而第三类则侧重分析的是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由于两位编者对这三部分内容的中心思想都已做了简要而明确的说明,因此这里我只对本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做进一步的简要阐述,它们被证明具有不同的“范式”(paradigmatic)意义。

从“范式”的专门意义上说,这两篇文章都是范式性的,“范式”这一术语是我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引入社会学的(它不同于托马斯·S·库恩(Thomas S. Kuhn)在其誉满世界的科学哲学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中所提出的更一般性意义的“范式”概念)。这两篇文章尽管都比较简短,但是就它们包含有一组密切相关的假定、概念、专门术语、主张和寓意——这些都可构成富有成效的社会学观点——而言,它们都是范式性的。一个范式因其成果而知名——其核心思想可被不断地以不同

方式用以发展它所针对的一定现象的新知识。

如本书第一章“科学界的规范结构”一文，所提出的范式性的社会学观点是，科学已发展成为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像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和宗教制度）。而且类似于其他社会制度，科学有其一套独特的历史上形成的社会规范，他们构成了科学的“精神气质”，但后来才更明确的一点是，科学界还存在着一个与之相关的“奖励系统”，此奖励系统与规范结构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到了科学的发展。<sup>①</sup>“奖励系统”这一术语是一种省略用法，因它所指的并不仅仅是对那些为公共知识积累做出贡献的人提供社会奖励，而且还指对那些违背制度规范的行为做出惩罚。读者会看到这些规范就是“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即科学评价应该是无私利性的）和社会的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这两种结构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科学家的分层，决定了他们在同行中的声望地位，这会为他们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不同的获取资源的机会结构。

作为经济学哲人和我的老朋友的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至少曾提出：“一个学者的著作[而且可以扩大地说，还包括他的一些论文]如同他的孩子。它们形成了自己的生命。”这肯定适合论“科学界的规范结构”一文的情况。对科学这一社会制度中的四类基本规范的提出，已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众多的讨论、批评、争议、应用及进一步发展的问題。至少是，自大约六十年前此文发表至今，不断的引证可表明其持续的影响。

因而，此文的历史以自我例证的方式，说明了其中的一个规

---

<sup>①</sup>如书中所指出的，本文尽管已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制度，但“科学界的规范结构”于1942年初次发表时，并未明确提出奖励结构，它是直到1957年我在发表的题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社会学的一个篇章”（《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2卷，第635—659页）一文中才明确提出的。

范,即社会的“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运作的常见情况。它意味着,并非某个科学家碰巧选择或自己选择了“怀疑主义”(尽管也有这类情况)。而是,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是心理过程。它包括为那些批评性地评价公共知识观点(以及自己的知识观点)的行为提供鼓励和奖赏的制度性机制。这会促使形成一种社会化过程,以审查这些知识观点中的缺点、错误和其他不足,以及以前未注意到的潜在的问题。我称此规范为社会性的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早已形成的对期刊论文和科学专著进行评价的制度化的同行评议的方式,它极不同于简单的个人性的怀疑主义方式。而且,它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有规范限定的和社会性怀疑的认知警惕系统。

当然,这里不适合列举某些批评这些规范的反对性观点,我仍然坚持原初的认为现代科学是一种社会制度的观点。这里也不适合去进一步争辩,真正的科学知识的进展必须要求这种制度性的基本环境。但是,根据理论社会学的基本原则,我偶然记起了那些批评者所提出的,科学中所建立起的规范可认为是这样的规范:它们只是社会认识上的规范,而不是被每一个和任何科学家都一致接受的实践性规范。然而,没有哪种社会制度能绝对地使其规范获得普遍遵从。不能因对科学规范的偶尔背离,如伪造数据,就错误地得出结论,说它仅仅是认识论的或者仅是观念性的规范(同样,也不能因出现凶杀偶尔违背了道德和法律规范,而下结论说它们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同样根据理论社会学,我也不会坚持这些科学规范都是一成不变的,纵使它们被刻在了永久性的石碑之上。

不必再列举这种不期望的更多的有关“科学界的规范结构”的评论,我从同行的评价中即可以得出,它已被证明是一篇真正的范式性的文章。因为此文以及更早的我的专著《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已被公认为是科学社会学的奠基性文献。例如1·

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这位美国科学史的元老,在其著作《清教主义与现代科学的兴起:默顿论题》(新不伦瑞克:鲁杰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得出了上述结论,而科学社会学家卡林·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Cetina),她作为“社会建构主义者”,对我的制度观点可以说是持批评态度的,然而她是以如下有意思的方式提出她对这一领域的总体看法的:

即使默顿的敌人(!)也都承认默顿是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当他1938年发表其经典之作《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时,科学社会学还是一个未被认识到的领域。50年之后,美国和欧洲已出现了大量的有关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研究的课程和研究中心,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已确定无疑了。<sup>①</sup>

如果说本书的第一篇文章是因创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学专门领域,而具有了范式性意义的话,那么,最后一篇论“自我实现预言”文章,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具有了范式意义。正是这一社会学观点,超越了社会学的领域,而变成了现代许多社会和文化中的语言和集体思想的一部分。

自我实现预言是指一个虚假的期望、信念或预测,由于它使人们按所想像的情况去行动,结果最初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结果。简言之,它是产生一种社会实在的过程,而这种实在在其他情况下是不会存在的。自我实现预言十分常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例子。例如,当谣传说一个实际上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将

---

<sup>①</sup>卡林·诺尔-塞蒂纳:“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全部的科学社会学?”《当代社会学》,1991年7月,第20卷,第522—526页。

要倒闭时,此谣言(即一个预言)就会导致足够多的存款者去银行取款,结果导致了这一银行的破产(而在其他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这种虚假的期望导致了自我实现。另外一个例子,比如当教师认为中产阶级的学生由于他们来自“较优越的家庭”,故比工人阶级的学生优秀时,这些教师就会更加关心他们,其结果是他们会的确表现得较出色。另外从更大范围来说的一个例子是,当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他们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时,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和,并总为对方的“进攻”行动和自己一方的“防御”行动担心。结果是,军备和军队大量储备,这就提高了实际战争的可能性。在所有这些类型的例子中,那种表面的但只是似是而非地“被证实的”预言却导致了永久的错误,因为预言者是把实际的(所推出的)结果作为依据,而它们从一开始就是无疑的。

自我实现预言所包含的基本社会学观点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除社会学学科外,它已在心理学、经济学<sup>①</sup>、哲学、政治科学、公共管理、人类学和教育研究中,被数以千计的文章所应用和发展。但这里我不去关注此类研究,而是说明这一概念与术语进入大众意识的大致过程。其中一个方面的标志是,它已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各国词典中的标准词条。例如我一生最看中的最宏大的英语词典——当然是《牛津英语词典》(OED)——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意义,其《增补版》的编者罗伯特·W·伯奇费尔德(Robert W. Burchfield)通过书面材料通知我,“自我实现预言”跟我所独创的其他概念与词语已被收录到了《增补版》第四卷中。而且它还被收录到了《牛津(Hachette)法语词典》(为“prophetie qui s'accomplit

---

<sup>①</sup>有关这一观点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和扩展的最近评论,参见罗杰·法莫(Roger E. A. Farmer)的著作第二版:《自我实现预言的宏观经济学》(麻州剑桥:MIT出版社,1999年)。

d' elle-meme”);《牛津西班牙语词典》(为“profesia que acarrea su propio cumplimento”);《牛津(Duden)德语词典》(为“die Bestätigung ihrer selbst mit beiträgende Voraussage”)。以上我简要回顾了“自我实现预言”这一术语变成行话的传播方式。接下来我将简要总结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应用。

回想起来,我记得自我实现预言观点萌生于我的论文“有目的行动的非预期结果”的结语几页,此文早于“自我实现预言”一文12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1936年,第1卷,第894—904页)。这几页涉及到了被证明是其相对的一个概念“自我失败预测”。当时提出

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预测常常不能保证实现,主要是因为预测变成了影响具体情境的新因素,因而可能会改变最初的发展过程。而那些不涉及人类行为领域的预测就不是这样。如哈雷对彗星的预测无论如何不会影响到彗星运行的轨迹[如在地球上我们最近一次看到它是在1986年,而在17世纪时哈雷就已预测到了];但是,对具体的社会例子来说,马克思关于财富逐渐集中而大多数人贫困加剧的预测就影响到了[我认为最好理解为:肯定已影响到了]所预测的事态的发展过程。

于是此文的结论是,自我失败预测对社会科学来说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但是社会科学家想去加以研究的人们所经历的现象,而且它对社会科学自身的研究提出了方法论问题,即有时对某些类型的社会预测进行经验验证的困难性问题,如果从原理上说不是不可能的话。

这明显地促使我去进一步思考自我失败预测这一现象与社会



行动的非预期结果这一更一般性的观点之间的关系。社会行动的非预期结果是贯穿于我论述 17 世纪英国的科学发展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因此,当我偶然读到富有创造力的 19 世纪的逻辑学家、以“文恩图解”而闻名的约翰·文恩(John Venn)的一段话时,立刻产生了共鸣。故我在论“非预期结果”一文的结语注脚中提出:

约翰·文恩使用了自毁预言(suicidal prophecy)这一生动的术语去说明[早先被认证的自我失败预测]这一过程,而且可以恰当地说,研究人类行为的各种科学大大忽视了这方面的探讨。参见其《变化的逻辑》(伦敦,1888年),第 225—226 页。

这导致我提出的问题是:除了我在此文中已考察过的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方面外,是否还有其他尚未认识到的非预期结果的类型?如果存在着“自我失败预言”,是否也存在着“自我实现预言”?而一旦提出这一问题之后,我很快也就找到了答案。自我实现预言的一种形式就是(在我看来当时是,现在仍然是),整个人类社会中所存在的对种族的、民族的、阶级的、宗教的及其他的“少数者”(他们当然有时在数量上并不占绝对多数)的歧视性对待。但是此序言现在所说的已比我设想的长了许多,因此,我不再更多地说明这一专题,毕竟,本书的最后一章对此有详尽的分析。

罗伯特·默顿



[2000 年 3 月]